

# 技术全面包围生命:马尔库塞与福柯的技术政治批判

赵庆波

(无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马尔库塞与福柯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既不是简单通过虚假理念来控制人的观念和意识,也不是简单依靠法律和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而是凭借技术来构建其高效统治的。资本主义所发明的各种技术政治机制并不相互否定、排斥,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程序和策略,相互链接、相互支撑,最终实现了对生命的全面包围。生命的整个历程进入了由技术所构建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成为了可被管理、生产和装备的资源物。面对主体生命被技术所塑造、操纵的现状,马尔库塞与福柯认为积极探索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技术实践所塑造的主体性形式,是反抗资本主义技术控制的真正出路。马尔库塞企图发展一种激进的、非顺从的政治实践来打破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的控制,而福柯则通过抵抗式斗争和生存美学来突破技术对主体生命的支配。

**关键词:**技术统治;生物性生命;主体性;马尔库塞;福柯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4)06-0019-07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凭借虚假的意识形态观念、法律和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而马尔库塞与福柯批判性地开启了理解资本主义统治的新进路,即资本主义的技术实践转向了生命的生物性层面,这使得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效地控制和生产了生命的整个过程,这也使得人类所遭受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严重。马尔库塞与福柯关于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的生物性的控制的研究,深刻构造了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盛的技术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的框架。因而,展开一场马尔库塞与福柯的理论对话,一方面有助于廓清两者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另一方面,将促使我们有效理解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复杂机制,并为构建新的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只有深入挖掘马尔库塞与福柯的思想遗产,才可能真正回答“我们现在是谁”的问题,进而才能积极探索和创造人类生活的另类形式。

## 一、技术作为统治的新方式

技术作为真理的客观形式,能够被普遍地运用于任何社会情景,即技术只是中立的手段,与其社会使用无关。这是技术中立论的实质内涵。这种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将技术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孤立出来,抽象地理解技术的本质,忽视了现代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马尔库塞与福柯深刻的看到了现代技术与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政治是技术化的,技术是政治化的,不建构一种技术领域就不可能实现特定的政治关系,不建构特定的政治关系就不会保障、投资任何技术。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与其社会使用无法分立为两个领域,因为技术在被用于特定目的之前,已经以具体的技术设计表达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阶级利益。技术不单纯是工具的总和,而是负载着特定的政治与利益诉求,这显著地表现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使用之中。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由一种变革社会的革命性力量转变成了奴役人、压迫人的统治力量,“技术本身成为了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体系”,<sup>[1]</sup>这意味着

收稿日期:2024-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9)

作者简介:赵庆波(1989—),男,甘肃庆阳人,无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技术以其特有的组织、规模以及它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成为了一种政治统治体系。技术凭自身的物质力量,成为了阶级剥削与统治的强力工具。也就是说,现代技术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秩序的需要是有着本质关联的,它服务于特定的阶级统治及其利益,成为了遏制社会变迁的统治力量。

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探究了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谱系学认为,社会事物的历史并不依赖于一种先验的定义,而是要从不同要素的聚集中追溯其演变。谱系学的进路可以用于分析技术系统,技术系统由不同要素聚集构成,具体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赋予了技术某种特定的功能意义。<sup>[2]</sup>福柯识别出了资本主义特定的权力机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权力与技术并不是一种僵硬沉重的外在关系,而是内在的勾连关系,权力通过技术的创新而不断地自我强化和更新,反过来权力又保障、构成、增长、投资了技术创新的范围和程度。权力渗透到了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之中,技术以其特有的设计实现了权力对事物之秩序、真相、仪式的操控。就此而言,技术绝不是独立于权力的单纯工具,而是起到干预和塑造人的行动可能性的权力效应。

然而,马尔库塞与福柯关于技术的政治效应的分析存在着显著的理论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马尔库塞主要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理论来论述技术的政治效应,而福柯是围绕着工厂、监狱、兵营、学校、医院等微观区域来阐发特定的技术程序所负载的政治效应。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统治体系把个体整合进了压迫性的等级和结构之中,成为维持和增强阶级统治的物质性力量,其存在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资本再生产的工具。福柯则明确反对不加限制地使用阶级统治理论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复杂多样的支配形式,他认为阶级统治理论是一种中心化的支配模式,并不能有效地说明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所发明的微观化的技术支配策略,而这些被忽视的微观策略恰恰实现了对个体的控制和生产。因而,只指出统治阶级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统治的位置、具体的形式,这样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暴露统治的真正支撑点。<sup>[3]</sup>也正是由于特定技术的建立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成为了可能,这些特定的技术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过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产物。福柯在微观实践区域对特定的技术化权力运作机制的描述,开辟了一条理解政治实践的新进路,这无疑对抽象政治理论无法回答当代政治实践提出了有效批判,破除了人们关于政治的贫乏想象。其二,马尔库塞是从理性的历史演变视角来分析统治技术的生成的,而福柯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出现来分析统治技术的建立。马尔库塞指出统治技术是由辩证理性演变而来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把个体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之中,被资本主义改造、组织为统治的材料。福柯则认为政治技术的建立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的产物,而是一系列不重要的进程汇聚而成的,“这些过程起源各异,领域分散,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它们因各自的领域不同而相互区别。它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一般方法的蓝图。”<sup>[4]156</sup> 马尔库塞虽然深受海德格尔技术理论的影响,但是他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分析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福柯则以尼采式的谱系学来研究政治技术的建立,不是以发生学的方式来追溯政治技术的建立的。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擅长用来分析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性、压迫性对个体能力和潜能的抑制,缺乏对非中心区域的复杂现象的详细考察。福柯的谱系学虽然有效描述了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对主体的精细化控制,但是并不企图对现代社会整体结构进行特定的图式化分析,也不塑造他人的政治意愿,而只是在特定的领域对现状进行批判,让抵抗点和可能的攻击点显现出来,告知人们攻击现状的可能途径。<sup>[4]</sup> 马尔库塞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这些根本差异,实质上表明了,马尔库塞以一种构成性的方式继承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遗产,而福柯则在关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批判中凭借尼采的谱系学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所支配的理论视域。

## 二、技术操纵人的生物性生命

技术统治的目标就是要以日益周全和有效的方式管控人的生物性生命,这促使政治机制的一次深刻转变。1950年后,马尔库塞写就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包括《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审

美之维》等,这些作品深刻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已深入到人的生物本能层面。在1976年的法兰西课程《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亦声称资本主义围绕着作为物种的人的生物学过程进行技术干预与调节。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技术实践介入了人的生物性生命,人的生物性生命成为了资本主义所控制、管理的目标。因此,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操纵这一问题,在马尔库塞与福柯之间开展富有意义的思想对话,这对于我们理解今日资本主义的控制模式意义重大。

对马尔库塞而言,技术操纵人的生物性生命,意指技术控制了人们的本能需要与欲望。马尔库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由技术所引导的消费文化重构了生命的本真需要。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利益,不仅主动地制造人们的需要,而且操纵了人们满足需要的方式,这具体表现为嵌入生活的大众传媒不间断地灌输和宣传各种与生活相关的消费理念,用各种层出不穷的创意与设计来引诱人们消费,“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的灵魂。”<sup>[5]</sup>技术设计的“符号”唤起和支配了大众的深层欲望,大众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彻底短暂、奇异诱惑的消费世界。当消费成为了个人思想与情感表达的社会流行形式,以及个人自我身份认同与生活意义的来源时,个人的需要已不是它本真的需求,而是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sup>[5]</sup>这种由技术所操纵的消费文化把社会的虚假需求移植成个人内心的自动需求,使得个体的需求与技术系统所预先提供的东西高度一致,个人的真实需求与愿望被长久有效地掩盖了。个人只有在商场选择如何消费的自由,“自由地”消费技术体系预先准备好的商品,“自由地”接受消费体系对其存在的整合与编排。也就是说,技术生产着大众的需求与愿望,大众被虚假的需求与欲望所控制、奴役,成为了依赖于生产链条的消费机器,自动地实现了社会形态以及自我异化状态的再生产。大众接受了技术体系预先为它安排好的需求与愿望,无力去思考、想象和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其二,技术对人的性欲活动的操纵。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深刻的意识到人的性欲活动成为了资本主义控制的新目标,“为了维持大量的能量和时间以便用于非满足性的劳动,必须实行这样的压制,但这些压制把肉体的非性欲活动持久化了,从而使有机体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操作的主—客体。”<sup>[6]</sup>资本主义为了满足其社会生产的需要,通过技术对生命有机体进行了特定的操控,把有机体的生物能量转换为社会再生产的动力。资本主义的控制渗透到了人的需要及欲望领域,这使得主体主动欲求对其生命本真需求进行压制。

马尔库塞关于消费文化与性的研究阐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进行了生产,生命的整个过程向政治经济学开放,人的视、听、感觉、情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被塑造得合乎政治、经济需要,即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由技术构建的政治、经济程序所重构,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纳入了资本价值化的过程和政治控制的范围,生物性生命形式就是资本主义技术生产的产品。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延伸和转换进了主体生命的生产领域,这使得主体生命的生物性活动首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被详细考察。由技术所构建的生命政治不单单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更是物质生产基础,它贯穿于被统治人口的整体存在,从内部生产主体生命的形式。<sup>[7]</sup>整体的生物性生命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复杂装置。

不同于马尔库塞从生物本能层面对技术操纵人的生物性的分析,福柯是通过现代政治的生物学转向来解读技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控制。福柯认为,现代政治转向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控制,实质上是采用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所建立的调节技术(technologie régularisatrice)。调节技术针对的是作为物种的人的生物学过程,“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大众的后果,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试图控制(可能改变)其概率,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针对人口现象,通过大众的生物学或生命社会学的过程来实现。”<sup>[8]</sup>也就是说,调节技术主要是围绕着整体人口现象进行干预,与之相关的出生率、死亡率、生殖、健康、种族、移民之类复杂的生物学偶然事件进入了现代政治的领域,成为了现代政治所管理的对象。既然现代政治控制已转移到生命的生物性层面,那么作为人的生物性最重要表现

形式之一的“性”就自然落入了生命权力算计的范围,“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目标。”<sup>[9]95</sup> 福柯指出,资本主义围绕着性建立了四大政治战略,包括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化、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反常愉悦的精神病学化,这些战略的目标就是操纵“性”,通过“性”来生产满足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身体与人口。可见,人的生物性生命是有关资本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事件,资本主义必须小心翼翼地围绕着人的生物性生存过程建立全方位的支配关系,才能保障其稳定和发展。人作为生物人进入政治领域,这意味着人的生物性生命被过程和生物法则所穿越、操纵、支配<sup>[10]</sup>,人的生物性生命成为了一个被知识、经济所高度投注的战略领域,一个不断被介入、开发的资源领域。

显然,马尔库塞指认技术统治体系把人的需求与欲望整合进了限定性的心理和社会空间,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效地控制和奴役了人的生物性生命。而福柯则指出技术化权力全面包围了人的健康、生殖行为、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人的整个生物性生存过程被纳入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层面。马尔库塞是基于资本的“再生产”来解释资本主义对生物性生命的欲望、需求、情感的生产,福柯虽然承认资本主义技术对生物性生命的生产有着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一面,但是他突出强调了这些特定的合理化技术所承担的保障生命安全、治理社会的重要政治功能。马尔库塞的工作深入推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对活劳动统治”的观点,有效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和生产体系对人的生物性操纵。而福柯感兴趣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条件的分析,特别是对权力结构、权力组织建立和发展方面所进行的分析。<sup>[11]</sup> 福柯显著地看到了一系列现代机构以一种相互配合的合理方式调控着人的生物性生存过程,有效地探讨了资本主义治理实践变革的内在逻辑。马尔库塞与福柯相互增益的研究表明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生物性操纵发生在一种关于生命的政治经济学之中,生命作为投资、塑造、开发的对象成为了可被管理的资源。

尤其是随着生物技术的创新,生物性生命正在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如分子生物技术“将生命想象为一系列可理解的分子实体之间的生命机制,这些分子实体可以用新的介入方法被识别、分离、操控、流通和重组,它们不再受自然生命秩序表面的规范性限制。”<sup>[12]</sup> 分子化赋予了生命流通性,这使的诸生命要素(如组织、细胞、DNA 片段等)可以在工厂、实验室、有机体之间自由地流通,可以跨越时空、物种、国际和区域环境进行买卖和交易。新型生物技术使得关于生命的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层面被更新:生命权力从物种层面深入到分子层面,并进一步扩展到整个自然界<sup>[13]</sup>。人的生物遗传基因、动植物基因片段等都被卷入了控制和掠夺的战略领域,成为了各个国家和跨国企业所竞相搜索开发的市场新领地。生物的经济价值已经作为一个可被描绘、控制的空间出现了,生物性生命在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上具有了商品交换价值,成为了牟取巨额利润的产业化商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人的生命控制也正在向分子生命、基因、神经元等维度推进,人口的结构和质量以及相关的种族、阶级、性别等也将在微观分子层面和基因层面被界定,而个体的生命、情感、性格、态度、欲望和需要亦能够通过分子技术进行诊断、监测和重塑。人的生物性生命与自然界都沦为了生物资本主义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原料,生物资本主义正在缔造一种日益充满风险的发展模式。今天人类的思想与命运是从生命的生物性角度被想象和构造的,这使得人类生命所遭受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严重。

如果说,马尔库塞工作的重要意义是暴露了技术对人的生物性操纵具有极权主义特征,即技术对人生物性的操纵使人丧失了批判、否定的内在力量,无法去想象一个自由与解放的社会,那么,福柯超越马尔库塞的地方在于,他识别出了资本主义所隐藏的法西斯主义面孔:为了在生物学上保障、优化、管理生命资源,资本主义国家以合理化的程序对生物学上的“劣等”种族进行屠杀,甚至通过战争消灭对立种族,以确保自身种族的纯粹和强大,“假若屠杀是现代权力的梦想,那么这不是古老的杀人权力在今天的回潮。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sup>[9]89</sup> 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操纵,是有着极其危险的一面的,这不单单是对人的生物性生命过程进行调

节与控制,更是对生物性生命实施大规模的屠杀与灭绝,这典型地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道主义的外衣下对其它国家不断发动的战争之中。

### 三、为新的主体性而斗争

马尔库塞与福柯的研究,实质上指认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实践深入到了主体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同时也侵入了更抽象、更普遍的生命结构之中。技术系统对人的生物性生命过程实施全方位的管理与控制,其目标在于将生物性生命纳入资本增殖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层面。资本主义所发明的各种技术政治机制并不相互否定、排斥,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程序和策略,以相互链接、相互支撑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对生命的全面包围。生命的整个过程都进入了由技术所构建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转变之一。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一个被技术所操纵、优化、营造、调控的实践场域之中的,生命形式就是资本主义技术所生产的产品。

当然,马尔库塞与福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命已经完全被各种各样的技术所控制和管理,不再规避它们的统治。马尔库塞相信主体仍然拥有革命的潜能,能够根本性地转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建构人性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环境。福柯则认为当技术化权力作用于拥有有限自由的主体时,反抗将始终内在于权力的运作之中。虽然两位哲学家对是否存在一个使人性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持有不同立场,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积极探索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技术实践所塑造的主体性形式,是反抗资本主义技术控制的真正出路。

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探索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所设定的主体性形式,需要建立“新感性”。由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已深入人的生物本能层面,人们在意识以及无意识层面认同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所限定和构造的经验世界,无法去想象一个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自由社会,因而对资本主义技术统治体系进行反抗与造反的前提就在于解放人的感知意识。而这急需发展一种激进的、非顺从的政治实践来打破技术对人的感知意识的束缚,这种政治实践被马尔库塞称之为“新感性”：“这种实践打破了看、听、感觉和理解事物的惯常方式,这样有机体就接受了一个非攻击性的、非剥削性的世界的潜在形式。”<sup>[14]</sup><sup>6</sup> 也就是说,新感性是对人的心理和生物本能的重构,新感性会促发和培育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主体,它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大拒绝”,“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文化。”<sup>[15]</sup>这种新的主体对事物与生活产生了新的感受和理解,不再以技术思维控制自然与人,而是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然和社会,构建一个合乎自由人需要的美的世界。因而,具有新感性的主体摆脱了不自由的技术社会所设定的压抑性满足,担负起了对现存秩序改造与颠覆的任务,致力于终结以惨烈竞争和剥削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方向,这包括消除贫苦与奴役,构建一个自由、美丽和安宁的新世界。马尔库塞通过感性革命来培育具有解放意识的人类主体,这种新主体能够担当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大任,彻底构建人类生活的新形式。

福柯认为马尔库塞的解放主义叙事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规划,他本人只愿意提供一些策略和工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抵抗式斗争。福柯指出技术在塑造主体时,已暴露其特定的控制位置和作用方式,因而行动者可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体上的特定技术发起反抗,如民众反抗医药公司对其健康的控制、工人通过罢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互联网用户反对信息公司对其隐私的窃取等。这种抵抗式斗争是非中心化的、直接的,充满着无数的对抗点,它并不追寻人类的永久解放、阶级斗争的终结这些宏大目标,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抵抗资本主义对人们的身体、生殖、生命和死亡毫无节制的控制。也就是说,身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种复杂的互动之中反抗和颠覆技术化权力的控制效应。第二,通过自我技术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所谓自我技术是指个人通过特定的技术“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和行为进行一系列训练,其目的在于转变、调整他们自身,或达到某种完满、幸福、纯洁、不朽的状态等。”<sup>[16]</sup>自我技术不是扬弃人的异化、重新占有人的本质,而是个人的自由创造,即个人通过有意识地自我训练、自由实践来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把自身当做一件艺术品不断创造,实现自身生存的

审美化、与他人关系的愉悦化。因此,福柯所倡导的抵抗式斗争和审美化生存不是以彻底毁灭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摆脱技术对生命的全面包围,而是通过扭转、变形资本主义技术生产所组织的权力效应,为主体的创造性转换敞开更多可能性的空间。

总之,马尔库塞期望培育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来激进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抑的自由社会,而福柯则不抱有以一个整体的阶级主体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更没有建立一个彻底解放的社会的理念,他只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策略性的斗争来改变权力流通的形式,从而为自身主体性的建构提供新的可能性。尽管马尔库塞与福柯对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持有不同立场,但是马尔库塞与福柯都赋予了美学以新特质:美不再是艺术家们所特有的制作活动,而是每一独特个体通过长期训练和日常实践来赋予生活以独特风格的行动方式。美的生存就要求与既定的分配秩序断裂,重新配置需求与欲望。如此,美就具有了变革社会的现实功能,美的生存就是拒绝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主体性形式,探索和想象我们可能之所是。

为新的主体性而斗争,这将不断上演形式多元的、非官方的、从局部弥散到全局的漫长斗争。它要求遍布在整个日常生活领域的成千上万的“无名之辈”自发地参与到变革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斗争中,抵抗凝滞化、固定化的权力关系,积极尝试破除一切政治话语与身份识别的霸权,构建更具流动性、开放性的权力关系,形塑独特的自我生存风格、生活行为和思考方式。这需要身体透过语词、符号、策略、游戏使自身从被指派的位置或角色中逸出,不断出离、逾越自身,体验亲临存在的无限审美快感。这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调用感性、感知和情感来打破既定技术政治秩序的感性分配,制造断裂、间隙和差异,使生命从被安排的场所中移动出来或改变该场所的控制目标。<sup>[17]</sup>这需要主体向不可见、不可听和不可言说之物敞开自身,对自然万物和生命有机体充满关切。为新的主体性而斗争,就是寻求不再被支配,积极探索和体验我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形式。

#### 四、结语

技术全面包围生命,这是马尔库塞与福柯立足于当代现实对康德在《何谓启蒙》一文所引发的“我们现在是谁”这一问题的深层回应:现代西方主体的整个生命历程进入了由技术所构建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主体的生命及其活动是一整套错综复杂的技术实践所积极干预、支配、调节的对象。因而,为了识别我们自身的身份,当然不能在抽象的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学说的框架中进行活动,而是要在具体的合理化技术层面分析现代主体是如何被制作的,这构成了质询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身份的关键。现代西方主体是形态多样的技术所规训、组织、构建的功能化的肉身动物,是可被管理、生产、装备的生物性生命。

日益强大的技术体系对人的生命的全面包围,使得人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因编辑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虽使自然生命的缺陷能够被修正,但却造成了人的主体性日渐萎缩,人的生命体验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增强和改造,人在技术生产线上被装配成了能够进行信息化监控的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sup>[18]</sup>。技术对人的身体和生物性生命过程进行设计、调节、制作,意味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对生命进行筛选、干预、创造的技术时代,人作为自然生命实体正转变为技术制造物,而这实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系统所投资和保障的。其二,既然人的生物性生命成为了政治、经济运作的战略目标,那么建立在生命政治框架之上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持、保障、优化自身人口的安全,在国家内部屠杀或驱逐某些“劣等”种族以确保整体生命更加健康,在国家外部发动战争消灭其它民族以实现自身的强大<sup>[19]</sup>,集中营和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便是其显著标记。阿甘本、奈格里和哈特等批判性地发展了福柯生命政治的政治学维度,而马尔库塞与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所具有的更加经验色彩的维度,则显著地在生物医学与生物科学领域获得了新的发展。<sup>[20]</sup>今天,这两个方面是休戚相关的,新型技术的发明提供了诸多对个体与群体进行干预的措施,生命政治在新型技术的架构下,不断更新自己作用的位置和控制的方式。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化马尔库塞与福

柯关于生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效综合上述两个发展维度,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技术政治境况。同时,激活马尔库塞的感性政治学与福柯的治理概念,有助于我们超越技术政治强加给我们的身份和主体性形式,探索和创造我们生活的另类形式。

技术对生命的全面包围,一边是优化、保障、创造生命,另一边却是区分、排除、消灭生命,这两者共生于现代政治的独特结构之中。因而,今日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识别由特定的技术所架构的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批判政治系统所安置的隐秘地基,其目标在于转变资本主义对生命纯粹技术化设置和筹划的社会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新的生命形式。

#### 参考文献:

- [1] 赫伯特·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文集第六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M]. 高海青,连杰,陶峰,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6.
- [2]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M].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创新团队,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39.
- [3]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 II, 1980—1988[M]. Paris:Éditions Gallimard,1994:496.
- [4]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 III, 1980—1988[M]. Paris:Éditions Gallimard,1994:634.
-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8.
- [6]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12:181.
- [7]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大同世界[M]. 王行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81.
- [8]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72-273.
- [9]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0]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M]. Paris:Éditions Gallimard,1994:193.
- [11] FOUCAULT M, GORDON C, PATTON P. Considerations on Marxism, phenomenology and power.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Recorded on April 3rd, 1978[J]. Foucault studies, 2012(14):100.
- [12] 尼古拉斯·罗斯. 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 尹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
- [13] BROOKS S.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to an evergreen revolution[J]. Sociologia ruralis, 2005(4):368.
- [14] MARCUSE H. An essay on liber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6.
- [1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0.
- [16] FOUCAULT M.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25.
- [17] 雅克·朗西埃. 歧义:政治与哲学[M]. 刘纪蕙,等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48.
- [18] HARAWAY D J. Manifestly Haraway[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5.
- [19] 赵庆波. 技术虚无主义:从海德格尔到福柯[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6):6.
- [20] 汪民安,郭晓彦. 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60.

(下转第 34 页)

## Digital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Review

CHEN Zaishang<sup>1</sup>, REN Yifei<sup>2</sup>

(1.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School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notion of electronic data in contemporary criminal proceedings has become outdated 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cessitates an upgrade to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vidence. Digital evidence represents a novel form of evidence, rooted in electronic data, and integrates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lockchain and algorithms. This form of evidence is capable of addressing th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digital era, aligni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vidence legal framework, and harnessing the strengths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view system.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precision in content, extensive applicability, and vulnerability in data integrity. Given the diversity of digital evid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adopt distinct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for each type. Therefore, a three-tiered classification judicial review framework, grounded in existing rules, with a focus on data authenticity, and leveraging algorithm as its cornerston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effective scrutiny of digital evidence.

**Key words:** digital evidence; types of statutory evidence; review rules; electronic data; algorithm

(责任编辑:董兴佩)

(上接第 25 页)

## Technology Surrounds Life: Marcuse and Foucault's Critique of Technopolitics

ZHAO Qingbo

(School of Marxism, Wuxi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Marcuse and Foucault point out that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m is neither simply the control of human concepts and consciousness through false ideas, nor does it simply rely on law and violence to maintain its domination, but rather it constructs its efficient domination by virtue of technology. The various technologized political mechanisms devised by capitalism do not negate or exclude each other; but they possess their own unique procedures and strategies. In a way that is interlinked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they ultimately realize the total surrounding of life. Therefore, the entire course of life enters in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constructed by technology and becomes a resource that can be managed, produced and equipped. In response to the present scenario where subjective life is shaped and manipulated by technology, Marcuse and Foucault argue that actively exploring a form of subjectivity that transcends the shaping of capitalist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is the true way out of capitalist technological control. Marcuse attempts to develop a radical, non-conformist political practice to shatter the grip of capitalist technology over human beings, while Foucault breaks through the domination of technology over the life of the subject through resistant struggle and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biological life; subjectivity; Herbert Marcuse; Michel Foucault

(责任编辑:傅游)